麻豆水堀頭的歷史地位與傳說

廖慶六
（美國 My family.com 公司高級顧問）

壹、前言

民國九十四年四月間，筆者因受託負責編纂西庄陳氏族譜，因此有機緣親履南台灣的許多鄉村聚落進行各項田調，而麻豆、官田及臨近的鄉鎮村莊更是一年多來最常到訪的地方。當筆者開始進行各項族譜資料收集，及血緣與地緣尋根之際，首先從陳家古舊神主牌位中發現，官田鄉西庄原來叫做「二太爺庄」。雖然對於二太爺庄之地名由來尚無定論，但在清初它是隸屬於諸羅縣開化里，這裡正是屬於明鄭以來漢人最早入墾的地區之一。到清乾隆中葉它是屬於麻豆保之轄區範圍，在清末的古地圖上已改用「西庄」之名。日治時期大正九年，西庄從原來的麻豆保劃出，並且併入現在的官田鄉之行政區域範圍，光復後又因西庄自然村之人口數較多緣故，所以合併人口數較為稀少的東庄自然村及瓦窯自然村後，另行規劃成立東庄村及西庄村兩個行政村。在另一方面，西庄陳氏開基始祖陳烏公（西元1686－1753年），於清乾隆18年過世後，因他的墳葬地點就在西庄與寮子廍交界處的三重溝附近，所以後來就被陳氏子孫尊奉為「三重溝祖」。

根據清初《諸羅縣志》記載，該邑境內之倒風內港共有三處海汊港口，而當時的開化里各村莊之間也曾是溪圳橫流，其中的茅港尾港，更有港水流至二太爺庄之記述。西庄隔壁村就是麻豆鎮的寮子廍，兩村在日治時代以前都設有糖廍，根據西庄與寮子廍當地耆老們的記憶與口述，這裡還有一條「三重溝」與水堀頭相通，傳說它是當地輸出蔗糖的主要運輸河道。我們都知道，姓氏族譜與地方志均屬重要的地方文獻，而族譜收錄之內容，也往往會兼顧及地方的發展過程與重要的文物保存。西庄陳氏祖先於三百年前來到臺灣，其中早期的二太爺庄及三重溝之地名，已具有歷史與地理方面的特殊意義，所以，能及時進行地緣尋根，也算是纂修陳氏族譜應該做到的工作項目。因此，筆者也就很留意西庄附近相關史蹟文物的訪查，同時也特別關心政府

與民間所推動的文化資產保護方案。例如：距離西庄不到二公里之水堀頭，目前該處尚留有一口龍湖及一口鳳池，這個地方就是陳氏族人及當地人俗稱的「龍喉」寶地，不但過去充滿著宗教信仰與地理風水上的種種傳說，最近更被地方政府評定公告為一處縣級的史蹟遺址（附表一）。[1]我們當然樂見政府撥款在此修復古蹟或建設具有展示與休閒功能的場所，但若有因考證不周就編列大筆預算，並以建設「麻豆港史蹟公園」之名，在水堀頭這個地方大事施工，不但會有破壞文化資產之憾，往後恐會遭到名實不符之譏。

史料不一定是史實，而眾人口述傳說也不一定能夠改變史實，但是學術研究就不一樣了。一般而言，學術性的調查研究必須懂得方法並遵守嚴謹的態度，因為學術調查研究之結論若有偏頗或缺失，就有可能誤導決策者並耗損政府的寶貴資源。考證地名與尋找史蹟，應該可以豐富族譜與方志之內容，但對西庄陳氏子孫而言，包括二太爺庄、三重溝、水堀頭、麻豆港等地理名詞，更因緊密的地緣關係而倍感親切，所以，時時予以關心談論或深入探索淵源，也許還能增添不少日常生活中的樂趣。總而言之，本文將從探索西庄與水堀頭的地緣發展關係出發，並以水堀頭的歷史地位及各種民間傳說為論述中心，也讓我們重新翻閱史籍與古地圖，以解開麻豆港與水堀頭之間的歷史謎題。同時，本文也試圖從林玉茹及劉益昌教授等人，針對麻豆水堀頭所做的一項調查研究報告，提出一些個人的不同看法。更希望藉此喚起地方政府重視文化資產的保護工作，更要謹慎處理文化資產的價值認定課題，對於不必要的迷信傳說，個人也想引用專家看法而略表一些不同的觀點。

貳、水堀頭的歷史地位

鄭氏三世，在臺灣經營共有二十二年（西元1662－1683年）。其拓殖區域，始之以承天一府、安平一鎮，並以南北附近二十六里為中心，再漸次向外開展，而開化里就是其中之一里。蔣毓英所撰《臺灣府志》一書記載，清領臺灣之初，改承天府為臺灣府，下轄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其餘坊里名號，均暫時因循明鄭之舊制。從明鄭到清初，茅港尾、水堀頭都在開化里範圍內；[2]水堀頭與茅港尾兩地相距僅十里，不但是連結諸羅縣城與安平郡城間的官道要站，同時也是一處防衛漢番聚落的重要據點，

1 台南縣政府文化局，〈麻豆水堀頭遺址〉，〈http://www.tainan.gov.tw/tnc/b8_excavation/excavation_03-5.htm〉。

2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民68年），頁278。

當時各設有汛塘與郵傳以安置班兵及舖兵。

水堀頭出現於史冊，應以清康熙五十六年周鍾瑄所撰修的《諸羅縣志》為最早。在同一志書中，同時又有二個地方都叫水堀頭，一在諸羅縣城附近，一在麻豆地區；地處麻豆者，邑志中以「麻豆水堀頭」稱之。[3]麻豆水堀頭，雖然沒有被拿來當做一個傳統聚落之名稱使用，但水堀頭與麻豆社這兩個歷史地理名詞，卻同樣受到史家的重視，因為它們是清代麻豆地域中最常出現於地方志與古地圖中者。例如：六部臺灣府志、一部諸羅縣志，及多幅臺灣古地圖即為明證（附表二）。事實上，在舊的麻豆地域範圍中，要以出現水堀頭地名之次數為多；以清代古地圖為例，包括：《諸羅縣志》卷首之地圖、劉良璧修《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之「諸羅縣圖」、故宮博物院典藏的「乾隆臺灣輿圖」、中研院史語所藏「乾隆臺灣番界圖」，及日本天理大學珍藏「清代乾隆中葉臺灣軍備圖」、「清代乾嘉年間臺灣郵傳圖」[4]，在過去開化里或麻豆保之轄區範圍內，都有「水堀頭」這個地理名稱或駐防的汛塘（附圖一）。水堀頭之歷史地位，約可分成下列四點：

一、軍事治安上

明鄭行寓兵於農之法，清朝兵制與明鄭就不一樣了。根據清康熙二十四年（西元1685年）蔣毓英纂修的《臺灣府志》記載，此時，臺灣鎮總兵轄陸師三營，駐防諸羅縣者屬於北路營，它只防汛八個地方，包括汛麻豆港，設管隊一名、兵二十名。此時距清領臺灣才僅二年，因此，軍事據點之安排恐怕是以港道、山隘等險要之地為主，其後重修之府志記載水陸營制，亦僅略敘北路營分防各汛。到了《諸羅縣志》纂修完成，在陸路防汛北路營部份，已有汛、塘之劃分，而全縣汛、塘總數也增加為五十處。其中有麻豆水堀頭汛，南出灣裡溪墘，北出茅港尾，西出佳里興，是漢番雜處之地，目兵二十名。

但是到了雍正十一年（西元1733年），除原有的臺灣鎮標三營之外，清廷又添設臺灣城守左右二軍，設參將一員，駐防臺灣府城。根據劉良璧撰《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記載，當時的臺灣城守右軍，有步戰守兵五百名。其中撥防佳里興汛，茅港尾、水堀頭、茭仔林等塘，兵二十七名。當時的佳里興、茅港尾、水堀頭、茭仔林等地，分別隸屬於開化里的佳里興保、茅港尾保、尖山保。其中茅港尾、水堀頭、茭仔林三

3　周鍾瑄，〈兵防〉，《諸羅縣志》卷七。

4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有典藏該兩幅地圖之複製品。

塘，相距都在十里左右，更形成一個三角戰略地位。此時麻豆街雖已成型，但尚無麻豆保之設置，可是水堀頭在軍事治安上之地位，已漸趨重要。爾後，在范咸修的《重修臺灣府志》及余文儀修的《續修臺灣府志》中，有關在水堀頭設塘派兵之制，一直維持不變。

二、交通運輸上

明清之際，臺灣的交通運輸主要是依靠陸路和水路。當時的開化里就與倒風內海為鄰，島內南北奔波或輸出穀糖土產，皆得利於官道和水道之便。過去水堀頭附近之村莊，到處都有水溝渠道通行，在乾隆二十年（西元1755年）集庄眾所立的「水堀頭橋碑」已有記載。[5]在文獻上，也有關於水堀頭地方的橋樑記載，例如余文儀的《續修臺灣府志》卷二：「麻豆店橋、麻豆口橋，並存水堀頭，相距數百武，南北孔道。」當時的水堀頭，應該也是進入麻豆社的主要門戶之一。

清朝驛道是屬官道，除了具有軍事功能外，也是庄民的交通幹道，影響日常生活至鉅。但驛站之設，通常有避開番社之跡象。諸羅縣從縣城進入開化里地區，就是走南北一直線以漢人為主的村莊，包括鐵線橋、茅港尾、水堀頭等地。水堀頭位在開化里內，周圍就有漢人墾居的聚落散佈，當時的水堀頭正是諸羅縣要城通往安平郡城的官道要站。

三、族群墾拓上

根據志書記載，水堀頭附近聚落是漢番雜陳之處，那裡有可能是早期漢番正面接觸的前哨站或緩衝區。其實，在距離水堀頭不遠的官田鄉隆田村，這裡仍是平埔族人與入墾漢族和平共處之鄉。隆田村舊名番子田，清代當地有一座番子橋，它是麻豆與尖山往來之大路。[6]事實上，目前這裡仍保存著代表西拉雅人文化傳統的公廨及阿立祖夜祭活動。

根據歷史文獻記載，麻豆社族人具有強悍性格，做為麻豆社之外圍，包括茅港尾、水堀頭及佳里興等地，清廷都設有塘汛並派目兵駐防，其目的可能就是要作為隔開漢番，或有保障漢族先民生命與財產安全之考量。後來廢塘汛是因為綠營被勇營取代，但是，到清末民番糾紛不再，因此，漢番防界線之設計功能，也就漸失原來之意義了。

5　吳新榮主修，《台南縣誌》卷十（台南：台南縣政府，民 69 年），頁 28。
6　吳新榮，《震瀛採訪錄》（台南：台南縣政府，民 70 年），頁 120。

四、民俗信仰上

台南地區是明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墾殖地，清領以後，此地仍保有很多南明遺民的習俗及信仰特色。這些南明文化遺跡，正是源自於閩南的舊慣習俗，因為鄭成功的原鄉在南安，而參軍陳永華的本籍是同安，其他部將或兵丁，不是來自金、廈兩地，就是以漳、泉兩府所轄之縣邑為多。現在居住在官田鄉官田村的陳氏族人，也是陳永華當年由家鄉帶來墾殖官佃的族親。根據李岳勳研究指出，王爺信仰乃是陳永華所創設[7]，而鄭氏王朝四個主要據點為臺、澎、金、廈，到目前為止，一般百姓對於王爺信仰仍是相當狂熱。

麻豆地區的王爺信仰是以五府千歲為主神，在「麻豆代天府」完成建廟之前，麻豆保舊屬各庄，向例每三年的農曆三月底前，都會舉行迎王爺出巡的「割香」盛會。事實上，「麻豆代天府」五王廟宇的重建，又與民國四十五年重啟水堀頭所在地的龍喉寶穴有關，因為當地信眾一直有地靈回復水堀頭之傳說。

參、水堀頭不是麻豆港

將水堀頭指認為麻豆港碼頭舊址一事，是近半世紀以來在麻豆地方最熱門的話題之一。根據相關的研究及媒體等文字報導，近人指稱水堀頭就是舊麻豆港者，是從民國四十五年在水堀頭地方開挖龍喉開始的，當時的台南縣文獻會胡丙申委員，曾經指稱這裡就是過去的麻豆港。[8]民國六十六年詹評仁先生所撰《麻豆鎮鄉土誌》一書，及民國七十二年由台南縣文獻會所立的「水堀頭橋石碑後記」碑文，也都持有相同的看法。其後是麻豆鎮公所與當地的文史工作者，於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初發起，並進行一系列水堀頭龍喉的勘查與挖掘之相關新聞報導。民國九十一年梁茂隆老師所撰的「麻豆港史話」一文，以及麻豆鎮公所出版的《麻豆鎮耆老口述歷史記錄》一書，也相繼有同樣的論述。最後則是在民國九十三年，由中研院林玉茹博士與劉益昌教授等人，在他們聯合撰述的「水堀頭遺址探勘試掘暨舊麻豆港歷史調查研究座談會」一書中，更以水堀頭就是麻豆港而做出五點結論與三項建議。[9]因恐積非成是而誤導社會大眾，並忽略繼續考證真正麻豆港舊址之重要性，筆者特此提出個人的一些粗略看法，並就

7　李岳勳，《禪在臺灣》（台中：國際佛教文化，民 61 年），頁 329。

8　同註 6。

9　台南縣政府編，《水堀頭遺址探勘試掘暨舊麻豆港歷史調查研究座談會》（編者：民 93 年，未出版），頁 231-234。

教於方家。

探討水堀頭是不是麻豆港之證據，似可從歷史文獻中所見到的各種地理名詞下手。首先分析附表二及附圖一所列舉的地方志及古地圖，至少可以發現與麻豆有關的歷史地理名詞，計有麻豆社、麻豆港、麻豆汛、麻豆舖、麻豆街、麻豆保、麻豆庄、及麻豆水堀頭等八個。[10]麻豆社代表的意涵較廣，可以把它當作住在麻豆地區的原住民總社或大社之名稱，也可以看做是一個獨立小聚落之番社名稱。事實上，臺灣地區對於地方上傳統聚落所使用之名稱，往往和不同時代之官方行政區劃不相吻合。因為村庄地名常因其位置重要性，地域規模大小，或人口數目多寡而區分為大庄（社）、小庄（社），大庄較有可能出現在官修的府志或縣志之坊里建制名稱，但是，更多的小庄（社）或土名，通常是被史家省略而不載的。例如：過去的諸羅縣開化里之轄區，鐵線橋庄、茅港尾庄屬於大庄，因此，在歷史文獻中可以找得到，它也可以做為行政村之名稱。另外，像二太爺庄、崁頂庄、瓦窯庄是小庄，在歷史文獻中就比較少看得到，它只能當做一個自然村存在。日治時代地籍番號有大字、小字之分，光復以後地籍名稱有大段、小段之別，這些都是屬於相同的道理或做法。

麻豆庄與麻豆社之命名做法雖然類似，但根據志書記載，這兩個不同聚落所在地應該是不相隸屬的，麻豆庄屬於開化里。在乾隆六年劉志的「街市」中，首先出現「麻豆街（在開化里、麻豆社）」之文字記載，它可能就是一條「漢番雜處」之街道，因為開化里是屬於漢人之社區，而麻豆社卻是原住民之社區。根據相關碑文記載，麻豆保名稱在清乾隆二十年就有了，但是它一直到乾隆三十九年余志的「坊里」中才出現，因為諸羅縣已增加三十九保、一庄，其中就包含了麻豆保之名稱。這個時候，麻豆保與麻豆社可能會有部份轄區重疊，至少耕地是在一起的，而且，麻豆社聚落也逐漸在消失裂解中。[11]接下來是麻豆港、麻豆汛、麻豆舖及麻豆水堀頭四個歷史地理名詞，發現它們都不是聚落名稱，卻各具有特殊的機能與歷史地位價值。事實上，若從字面分析與邏輯推論，最有可能指向同一地點的情況有二種：一是麻豆港、麻豆汛、麻豆舖；一是麻豆汛、麻豆舖、麻豆水堀頭。其它排列組合機率尚有多種，但因與辯解水堀頭不是麻豆港之議題無涉，故不予贅述。第一種情況就和茅港尾港及鐵線

10 「麻豆」一詞，西拉雅族之原意為眼睛，雖然在不同時代，都有不同的文字寫法，但本文統一使用「麻豆」。

11 余志「番社」記載:麻豆社，近番眾分居，距舊社 12 里。據了解，當時應有遷居到官田的番子田等地區。

橋港一樣，那就是港、汛、舖合一；第二種情況較有可能，但仍欠缺史料以供佐證。另外麻豆水堀頭，亦可簡稱水堀頭，但為了要與縣城的水堀頭做一區分，所以，有時就用麻豆水堀頭。綜合以上麻豆諸地名之分析，證明麻豆港與麻豆水堀頭兩個名詞，本來就是屬於位置不在一起的地名。因此，林玉茹等人之研究報告中，在結論一所引文獻為蔣志與周志，還無法做為麻豆水堀頭等於是麻豆港的有力證據。[12]

再以麻豆港與麻豆水堀頭在方志中的文字敘述為例，因為麻豆港是一個地理上的專有名詞，它應有一個特定地點以供船隻停靠，必須具備有基本的港口機能。據《諸羅縣志》卷一記載：「倒風港：倒風之水分三港，北為鐵線橋港，海汊，往郡大路，有橋，商船到此載五穀、糖、菁、貨物，港水入至打鹿崎止。南為茅港尾港，海汊，往郡大路，有橋，商船到此載五穀、糖、菁、貨物，港水入至二太爺庄。西南為麻豆港，海汊，商船到此載五穀、糖、菁、貨物，港水入至麻豆社邊止。」以上三個汊港，北為鐵線橋港，南為茅港尾港，都有「往郡大路，有橋」之文字內容，因為這兩個港口位置，都在往郡城之官道上，港邊且有橋樑接通。但是，唯獨麻豆港沒有「往郡大路，有橋」之文字敘述，因為它確實不在官道上。從地圖方位上看來，如果水堀頭是麻豆港的話，其港口所在位置，就不應該被寫成是西南方向了。《諸羅縣志》卷七營制，載明麻豆水堀頭，是北出茅港尾的。[13]如果水堀頭是麻豆港的話，茅港尾港就不能算是三個倒風內港中，屬於南邊的汊港，因此麻豆港不在水堀頭之理甚明。

另以古地圖資料為例，在《諸羅縣志》卷首所附地圖中，麻豆港與倒風內海之另外二個汊港，茅港尾港及鐵線橋港，其港口名稱與位置標示都很清楚。另外的麻豆水堀頭汛，地圖中雖僅標示「汛（在開化里）」，但在卷七營制之文字中已有敘明，因此，可辨認該處應屬麻豆水堀頭汛之位置，因為它同樣位在往郡大道之上。參考乾隆中葉以後所繪製的各種輿圖、軍備圖、郵傳圖、番界圖，水堀頭汛或塘之位置，也很明顯都畫在官道上，可做為很好的佐證。事實上，麻豆港在附圖一的六幅古地圖當中，亦僅在《諸羅縣志》卷首地圖中出現過一次，而該地圖中的麻豆水堀頭汛與麻豆港，仍有一小段距離，且麻豆港是畫在麻豆社邊，因此，麻豆水堀頭與麻豆港，兩者顯然有所區別。

最後，以當地所發現的三合土遺跡來說，主張麻豆港舊址位在水堀頭者，認為水

12 同註 9。

13 周鍾瑄，〈倒風內港〉，《諸羅縣志》卷一，頁 414。

堀頭尚留碼頭遺跡一處，為糖水加糯米汁，再摻混礪灰及砂的三合土築成，應是開始於荷據時期的主要砂糖輸出港。自乾隆年間以後，倒風內海大部份浮覆為陸地，航道淤塞，麻豆港功能喪失，後來成為一片荒涼田野。[14]也有人認為，在麻豆水堀頭已挖掘到古銅幣、清代磚瓦，及一支船隻用的方形鉚釘等古物，可證明水堀頭擁有古代內陸港口之特質。[15]事實上，這些證物都顯得有點單薄而無法令人折服。因為若以單一三合土遺跡，或一支船隻用的方形鉚釘，就認為水堀頭是麻豆港之論述，恐怕證據都太過於牽強薄弱。筆者最近在福建漳州地方看到很多的夯土古建築物，包括做為房屋地基、牆體，橋樑與水利結構，所見都有。水堀頭之三合土遺跡，是屬於清代的一種夯土建築物體，它有可能是清代做為汛塘班兵駐守之建物，或做為當地水利灌溉及橋樑引道之用，但也有可能是當地舊式糖廍所用之石埒或地基。

林玉茹將清代臺灣港口分成七小期，再依據港口的泊船條件、商業機能、軍事機能，以及行政機能作為綜合指標，將清代大大小小的港口粗分成五種等級，其中麻豆港被歸入屬於位階較低的第四級港口，僅作為地方性的轉運港口，其腹地小於一個保或里的出入口，港口存續期間則為西元1684年至1829年間。[16]麻豆港在歷史文獻記載之存在時間確實不長，但何時消失走入歷史，卻仍有待深入詳查。至於麻豆港舊址到底在何處，也只能依靠更多的考古挖掘工作來證實。

目前從十九世紀末之日清戰爭相關文獻與地圖中，大約可以看出在西寮附近，有可能就是麻豆社的舊址（附圖二）。西寮之地名可能是從西拉雅族（Siraya）的音譯而來，根據考古文獻記載，該地區出土文物特別多，西寮遺址已經被證實為目前臺灣最大的遺址。[17]詳閱此張軍事作戰地圖核心處，從西寮往南走，所見村莊地名依序有連表、廍崎頂及麻豆庄。右邊則散佈著南勢角、寮子廍、總爺庄之地名；西邊到埤頭庄之前是一片空白地方，約屬於今日北勢寮之地域範圍，這裡很有可能就是過去麻豆港舊址。日治臺灣從西元1895年開始，當時，倒風內港都已浮覆成陸地，而麻豆社也從地圖上消失，取而代之的都是庄名，同時，水堀頭之地名也從地圖中消失了。今日要找到麻豆港舊址確實較難，但以北勢寮附近做為麻豆港舊址之可能性頗高，因為在天

14 梁茂隆，〈麻豆港〉，《88 年度台南縣產業文化活動麻豆文化節》文化篇（台南：民 88 年）。
15 同註 9，劉益昌撰，〈考古試掘成果報告〉。
16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台北：知書房，民 85 年），頁 62，109-128，205，342。另據江樹生所譯西元 1647 年之荷蘭文獻，即有麻豆港及麻豆河之記載。
17 許清保，《南瀛遺址誌》（台北：文建會，民 92 年），頁 78。

理大學所藏乾隆年間臺灣軍備地圖上，就有一處叫做北岸塘的地方，這可能指該地是位在麻豆港之北岸。事實上，北勢與北岸在語意上是相通的。此外，過去水堀頭地方可以理解為一處小港道，或許具有小型港口機能，但可能還達不到清代最基本的港口分級標準。而且，要運輸或出口農產品，還須先將貨物轉運至倒風內港，例如：茅港尾、麻豆港，甚至是蚊港等地。

肆、水堀頭的民間傳說

麻豆水堀頭出現在史籍的時間不算很長，大約是從清康熙末年到同治年間（西元1717-1874年），我們才能從地方志和古地圖中找到「水堀頭」這個地名；從清光緒中期到日治初期的南部區域地圖中，也幾乎是看不到有水堀頭之地名。水堀頭在麻豆地方歷史上曾扮演過一定份量的角色，但隨著它本身機能及附近聚落的消失，水堀頭之名也就很快跟著走入時光隧道。水堀頭不是一個聚落名稱，此地尚有數棵高大茂盛的古榕樹，還有磚石、瓦礫、墳墓充斥著，因此，水堀頭的周遭環境頗像一處荒涼廢墟，感覺有點陰森而人跡少至。日治時期政府卻在附近大興土木，重大灌溉與排水系統都經過此地，嘉南大圳及總爺大排就是向「水堀頭」借道而過的。一直到民國四十四年五月十五日，有台南縣文獻會委員朱峰先生，在當地採集到一塊不很完整的「水堀頭橋碑」碑文。[18]隔年一整塊的石碑出土之後，才大大的引起當地民眾對水堀頭歷史的記憶與重視。老實說，包括：龍喉地理、後牛稠厝、王爺降乩，這些話題都是圍繞在水堀頭地方的神奇故事，像清帝陰敗地理龍穴、五王回鄉救地理之傳說，也的確是非常聳人聽聞，無形中，也增添百姓大眾對水堀頭舊地的懷念與崇拜。

探討水堀頭的歷史地位與民間傳說，除了方志、地圖及耆老口述之外，我們還可以拿當地現有的三塊碑文加以佐證說明。三塊碑文包括：最早立於清乾隆二十年的「水堀頭橋碑」，後來立於民國六十五年的無名碑，及最後在民國七十二年所立的「水堀頭橋石碑後記」。此外，目前當地還立有一塊台南縣政府的「麻豆港水堀頭遺址」公告牌，及一位民間人士所張帖的「麻豆水堀頭龍泉由來」詩文。綜合這些碑石文字內容，無非在敘說水堀頭是一塊聖域，附近因街頭溪圳橫流而有善心人士捐資造橋，此地因曾有港灣碼頭而商賈雲集，且因地靈再現而五王要回鄉建廟。其中關於五府王爺回麻豆，還牽涉到在龍喉掘石應驗之神奇故事，這就是發生在民國四十五年的

18 吳新榮，〈水堀頭古碑〉，《南瀛文獻第》三卷（民 44 年 12 月），頁 127。

挖寶事件，但最後卻促成了五府千歲麻豆代天府之興建。

水堀頭的興衰演變，有謠傳是因乾隆皇帝派人到此破壞地理所引起的。相傳乾隆二十年的建造水堀頭橋，就是清廷假托建枋橋而行陰敗風水之實，如此，才能斬除龍穴之靈氣，此地才不會出反王。加上臨近的崁頂庄因已廢庄，所以，民間還有「從曾文敗到崁頂」之傳說。一般人都會相信，既然本地有龍喉與鳳池寶穴，所以，麻豆地區將會因地靈而孕育出領袖人才。據說民國四十五年五月時，先有「採生乩」指示水堀頭橋下原來是一龍穴，但因裡頭有很多污穢之物，必須趕緊雇工開掘清除，如此五王才願意回鄉建廟永駐。後來，果然挖出很多搾蔗用過的破石車。但是吳新榮並不認同上項說法，他說：「我們不能信為一大清政府，恐怕這些地方發生叛國者而出此劣策。但為治水工程而至土積港墘，而至社衰人亡，這是可能的事實。」[19]他同時還提到，此橋附近的一處三合土遺蹟，有可能是「水瀨」或「土階」或建築物的一部份，甚至有可能是一巨墓的一部分。事實上，台灣多地震與風災，房屋建物最容易受到侵襲燬壞，若要以人為故意破壞是較不可能的。

黃清淵曾經指出，茅港尾的急速衰落，與發生於同治元年（西元1862年）大地震有關，震後又有霍亂及瘟瘧症之橫行，疫厲相繼，因此，死亡枕藉。他說：「五月十一日亥刻，乃有怪聲自東南來，三座巍峨之天后宮亦圮。可憐安樂土，一剎那化為修羅場，其後統計，即死172人，延死亦有數十，朝夕一號，慘聞數里。」在地震發生前，雖有天后降乩之說，但他認為：「天后降乩一節，頗涉怪誕不經之談，君子無取焉。然遺老尚能言之如畫，姑節錄之，以俟博理之君子。」[20]水堀頭與茅港尾都有神諭之傳說，但是，崁頂庄及水堀頭本來就很靠近茅港尾，因此，包括崁頂庄聚落的消失，及水堀頭地名的走入歷史，恐怕都與發生在西元1862年的茅港尾大地震，及震後的流行瘟疫有很大關係吧！

伍、結論

水堀頭在麻豆地區擁有一定份量的歷史地位，但就水堀頭和麻豆港之地名來講，他們在歷史上的存續時間，各有150年左右，但它們從地圖上消失的時間，卻都已超過一百年以上，因此，容易造成辨識上的困難。水堀頭這個地方位在明末清初的開化里

19 同註6，頁120-122。
20 黃清淵，〈茅港尾紀略・震災志〉，《臺灣輿地彙鈔》（台北：臺灣銀行，民54年）。

，這裡是明鄭以來漢人最先的墾殖地之一。水堀頭也是縣城通往郡城的官道站，同時，有可能是最初漢番在麻豆地區的接觸地，附近的漢人墾殖聚落，有茅港尾、崁頂、牛稠仔、總爺、二太爺、寮子廍等庄，而最早的麻豆庄及麻豆街，也應該離此不遠。水堀頭地方有五王救地理之傳說，也有最具本土化特色的王爺信仰，因為這地方被認為是一塊龍穴寶地，因此，也促成麻豆代天府的興建。

從諸多古地圖看來，水堀頭之位置似乎不在倒風內海之邊緣，它不像是一處倒風內海的汊港。在歷史文獻上，從來沒有提到過水堀頭就是麻豆港，今人對水堀頭是麻豆港舊址之說，又因欠缺有力證據而難以令人信服。因此，繼續調查麻豆港舊址，找出三重溝與水堀頭，或二太爺庄與茅港尾港之關係，都是吾人不容忽視的課題。